

## 一位粟特首领的丝路生涯——史君石椁图像素描

荣新江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2003年在北周都城长安东郊(今西安市未央区井上村东),发现了一座大型斜坡土洞墓,墓主人是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出土一套刻画图像丰富多彩的石椁,另外还有金戒指、金币和金耳坠等带有明显西方特色的珍贵文物。在石椁门楣的上方,镶嵌着一块长方形的石板,上面用粟特文和汉文刻写着史君的双语墓志铭,据铭文可以清楚地知道,史君出身粟特史国(Kish),入华后为凉州聚落首领——萨保,卒于大象元年(579),葬于大象二年<sup>1</sup>。

长安东郊的史君墓并非孤立的存在,在其周边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北周保定四年(564)的鬲宾人赠甘州刺史李诞墓<sup>2</sup>、天和六年(571)的粟特康国(Samarkand)人大天主康业墓<sup>3</sup>,以及与史君同年入葬的粟特安国(Bukhara)人同州萨保安伽墓<sup>4</sup>。这些北周时去世的胡人首领墓的集中埋葬,恐怕不是偶然的,而是北周末年的一种国家政策,即笼络胡人首领,以期利用胡人聚落的武装力量,来增强国力。

这些胡人首领身份不同,入华年代也不一样,因此反映在各自的墓葬葬具及其图像的内容上,也不一致。最早的李诞墓采用中国传统的石棺,上面的刻画内容主要是伏羲、女娲和四灵,是比较传统的中国葬具形式。康业墓内是一套围屏石榻,围屏上刻画的图像也主要是中国传统所具有的宴饮、出行图,技法与中国传统石棺床上的围屏孝子图像颇为类似。到了580年入葬的史君和安伽,采用的虽然是中国北朝以来传统所用的葬具——石椁和围屏石榻,但上面的图像则几乎描绘的都是胡人的形象,与李诞、康业完全不同。或许胡人首领在刚刚接受汉地的传统葬具时,还没有太多的自我文化表现意识,可能也还没有如何表现胡人丧葬观念的图像粉本,因此基本上接受了汉地的传统图像模式。但经过一段时间后,两位萨保级的人物史君和安伽,则在石质葬具上刻绘了胡人生活和丧葬的情景,表现出胡人自己的文化面相。即使是同一年入葬的史君和安伽,图像也不完全一样,虽然都有宴饮、狩猎、歌舞、出行等场面,但史君图像上的游牧族首领是嚧哒王,而安伽的则是披发的突厥可汗,表明史君的历史记忆年代要比安伽的更早一些。史君出自更为西面的凉州,除了胡人首领萨保的职衔外没有像安伽那样拥有北周官僚系统中的“大都督”一类的职称,而且其墓志还保有粟特文的部分,都说明史君的“胡味”更为浓厚一些,反映在他的石椁图像上,也更加“胡化”。

自史君墓发现以来,国内外研究粟特学、考古学、美术史、中外关系史等方面的学者,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探讨过史君石椁的图像,使得这些图像的内涵日益彰显出来。杨军凯《入华粟特聚落首领墓葬的新发现——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墓石椁图像初释》,有对一些关键图像

<sup>1</sup>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墓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第3期;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北周史君墓》,文物出版社,2014年。以下引《史君墓志》汉文部分均据此,并依笔者看法略有改订。

<sup>2</sup> 程林泉、张翔宇、张小丽《西安北周李诞墓初探》,《艺术史研究》第8辑,2005年。

<sup>3</sup>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周康业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6期。

<sup>4</sup>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文物》2001年第1期;又《西安北周安伽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

的初步比定<sup>5</sup>。吉田豊（Y. Yoshida）在考释粟特语史君墓铭时，简要提示了石椁西壁、北壁顺时针描绘着史君夫妇及其三个儿子的生活场景，并指出毡帐中的游牧首领是嚧哒王<sup>6</sup>。拙文《北周史君墓石椁所见之粟特商队》，结合其他资料讨论了粟特商队的构成<sup>7</sup>。丁爱博（A. E. Dien）《关于史君墓的考察》，认为石椁上从 W2 到 N5 几栏图像描绘着史君一生的行历<sup>8</sup>。葛乐耐（F. Grenet）和黎北岚（P. Riboud）合撰《一幅嚧哒帝国景象图：萨保史君墓葬浮雕上的生平叙事》，指出史君石椁图像描绘的是嚧哒帝国晚期粟特首领史君的生平叙事，他们就一些图像的时代和地域特征做了详细考察，指出史君图像同时表现了粟特和嚧哒的文化<sup>9</sup>。丁爱博对两位法国学者的一些细节解说有不同看法，又发表《粟特人史君墓：萨宝生活管窥》加以商榷<sup>10</sup>。至于石椁南壁和东壁的图像，葛乐耐、黎北岚与杨军凯合撰《中国北方西安新发现的粟特墓葬中的祆教画面》，指出这是最具琐罗亚斯德教内涵的丧葬图像<sup>11</sup>。虽然各家的观点并不一致，有些还非常相左，但这是学术研究中必然经历的过程。

这些研究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特别是对于史君图像表现其人生经历和丧葬过程的解说，应当是史君石椁图像的最为基本的内容，是一条主线，沿着这条主线来看待相关的具体图像，一些问题可以通解。但由于这类粟特首领墓葬的图像比中国传统的图像和佛教图像要少得多，因此还有一些画面目前无法解说，这也同样是学术研究中的正常现象，我们与其用与主体图像不相关的传统或佛教的个体图像去解释它，还不如存之待考。

本文就是想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和笔者的一些看法，对史君石椁所表现的凉州萨保史君一生的行事加以素描式的解说，以期还原一个粟特人从粟特本土到中国内地的生活经历。从出生、成长，经过东来兴贩贸易，到建立聚落，受命为萨保，最后享受晚年的安逸生活，以及去世后经过钦瓦特桥而升入天堂，史君的图像是许许多多丝绸之路上奔波的粟特商人的现实生活场景，它帮助我们古代丝路上商贸及其他活动的点串成一条线。粟特人是中古时期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承担者，他们在丝路上建立了完善的贸易网络，史君石椁给了我们认识丝路粟特商人的一个非常形象的个案。

图像从西壁开始，由右向左读，编号从 W1 到 E3，我们依次展开史君生涯的完整画卷。

### （1）授记与诞生

《史君墓志》粟特文部分称：“此石制坟墓（即神之居所）是由毗黎沙漫盘陁（Vrēshmanvandak）、射勿盘陁（Zhematvandak）和拂鹵吐盘陁（Parōtvandak）为了他们的父母的安全而在合适的地方建造的。”因为是三个儿子为其父母所建，因此描述的内容应当

<sup>5</sup> 荣新江、张志清编《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17—26页。

<sup>6</sup> 吉田豊《西安新出土史君墓志的粟特文部分考释》，荣新江等编《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32页。以下引《史君墓志》粟特文部分，均据此文。

<sup>7</sup> 荣新江《北周史君墓石椁所见之粟特商队》，《文物》2005年第3期，47—56页。

<sup>8</sup> A. E. Dien, “Observations Concerning the Tomb of Master Shi”,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new series, 17, 2003 (2007), pp. 105-115.

<sup>9</sup> F. Grenet and P. Riboud, “A Reflection of the Hephtalite Empire: The Biographical Narrative in the Reliefs of the Tomb of the Sabao Wirkak (494–579)”,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new series, 17, 2003 (2007), pp. 133-143.

<sup>10</sup> A. E. Dien, “The Tomb of the Sogdian Master Shi: Insights into the Life of a Sabao”, *The Silk Road*, VII, 2009, pp. 42-50. 以下提示的学者不同看法，基本上来自上述三篇文章，为节省篇幅，不一一对应出注。

<sup>11</sup> F. Grenet, P. Riboud, and Yang Junkai, “Zoroastrian Scenes on a Newly Discovered Sogdian Tomb in Xi’an, Northern China”, *Studia Iranica*, XXXIII/2, 2004, pp. 273-284.

是墓主人史君夫妇的事迹，即图像的主人公是史君，而不是别人。

研究者一般都从西壁 W2 的孩童说起，但从图像的顺序来说，W1 应当是整个故事的开头（图 1）。但 W1 的画面是目前最难解释的一幅，其上部有一形体稍大的神祇，有背光，坐莲座上，像是说法的样子，前面是一对夫妇作供养状，旁边有三人一组计三组听法的信徒，装扮各异。下部有七只动物和五个人物，分列两侧，作听法状。一对狮子与人在一起，雄鹿、羚羊、绵羊、野猪与人相向在另一列。神像交脚盘坐，头挽小髻，面有髭须，右肩袒露，左肩披帛，既像释迦，又似老君。

魏义天（É. de la Vaissière）在《公元六世纪中国的摩尼》中认为，上部的主神是光明之神——摩尼，其下有三个带着高帽的摩尼教僧，他们正主持史君夫妇的忏悔仪式，史君等在面对着各种狩猎过的动物忏悔。他还联系到东壁钦瓦特桥（Chinwad）图像有肉体堕落，认为是摩尼教教义所说的“身体残渣、黑暗部分将坠入地底”<sup>12</sup>。这种看法得到吉田豊的支持，他对比大和文华馆所藏摩尼教《六道图》，指出动物对面是史君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儿子；又根据公元 6 世纪嚧哒统治下的巴克特里亚地区有摩尼教流行，而史君与嚧哒首领有过交往，因此推测他可能在巴克特里亚从事贸易时皈依了摩尼教<sup>13</sup>。但这些看法尚难定论，如果说北周时摩尼教图像已经进入中国，似乎还缺少必要的旁证材料。

我们与其说是摩尼教的忏悔图，不如说是一个未知神祇对史君出生的授记，6 世纪末叶长安地区应当已有“老君化胡”的说法，这个画面更像是老君说法，预示一个新的胡王的诞生，而神祇前面的夫妇，则是史君的父母；周边的三种教徒和世俗人物以及动物，都在等待一个伟大人物的诞生。

据《史君墓志》，他原本是西域粟特地区的史国人，名字的汉文部分残损，粟特文作 Wirkak（尉各伽）。579 年史君去世时 86 岁，推测他出生在 494 年。《墓志》说：“祖阿史盘陁（Rashtvantak），为本国萨保；父阿奴伽（Wanūk），并怀瑾握瑜（瑜），重规迭矩。秀杰不群，立功立事。”这里虽然没有直说史君父为萨保，但从一般的情形来看，萨保都是世袭担任，而且这里说“重规迭矩”，“立功立事”，就是说其父按其祖父的规矩办事，立有功勋。这里说他祖父任职本国，而也没说其父来到中国<sup>14</sup>，所以应当都是在史国的情形，而史君也是生在史国。W2 的图像上（图 2），应当表现的是史君的父母坐在一个亭子中间，戴着有翼王冠的父亲怀抱一个孩童，当即史君，旁边有两个伺候的仆人。亭子是粟特式的，顶上有日月形图案，亭子的台阶前蹲着一条具有琐罗亚斯德教守护意义的狗。以上图像的上半表现的是史君的出生。下半主要是一幅备马图，一匹没有人骑乘的马，前面有侍者伺候，后面有一人撑着华盖，等待着长大后的史君乘骑出行。前面是山石和流水，流水与下一幅图像联通，预示着史君将踏上征程。

## （2）狩猎与出行经商

W3 描述史君长大成人后的狩猎、经商活动（图 3）。上半部的狩猎图上，中心人物是作王子装束的年轻史君，他戴着有翼王冠，骑马飞奔，弯弓射箭，前面的五只动物，一只已中

<sup>12</sup> É. de la Vaissière, “Mani en Chine au VI<sup>e</sup> siècle”, *Journal Asiatique*, 293.1, 2005, pp. 357-378.

<sup>13</sup> 吉田豊《宁波のマニ教画：いわゆる〈六道图〉の解釋をめぐって》，《大和文华》第 119 号，2009 年，10—12 页。

<sup>14</sup> 石见清裕《西安出土北周〈史君墓志〉汉文部分译注・考察》认为这里的“本国”指北魏不可取。其文载森安孝夫编《ソグドからウイグルへ——シルクロード東部の民族と文化の交流》，汲古书院，2011 年，67—92 页。

箭倒地，其余的雄鹿、羚羊、野猪和兔子正拼命奔逃。主人身后跟随一位披发的嘍哒或突厥人，手臂驾狩猎用的隼。画面前面有一只面对主人的护卫犬。

画面的下半部表现一个行进中的商队，有驮载货物的马、驴和骆驼。一个首领模样的人骑行在商队中央，手握望筒，正在眺望远方；外围三人，两位在前面像是护卫着商队，一位在后持鞭驱赶着牲口；商队的前面还有一只护卫的犬。有的学者把这三位看作是史君的三个儿子，但 Miho 美术馆藏粟特围屏上也有一幅商队图，骆驼的前面和右侧各有一胡人随行，左侧是三个披发的嘍哒或突厥人骑马护行<sup>15</sup>。因此，这三人未必就是史君的儿子，我们不知道史君分别在哪一年得子，而这幅图像应当表现的是史君早年随商队出行的样子，商队首领也不一定是史君。

W3 上半的狩猎和下半的商队图似乎有个先后的关系，但实际生活中狩猎和经商往往是同时进行的，因为狩猎不仅仅可以解决商队行进中的食物供给，也可以把猎得的皮毛作为贡品给游牧族首领，或者作为商品出售。狩猎和商队的图像，或许可以和《史君墓志》的下述文字呼应：“少挺（口）石，又擅英声。而君秉灵山岳，（口口口）志。”表明是史君成长过程中的一幕。

转到 N1 的画面（图 4），上半部图像的中心位置是一顶帐篷，里面盘腿坐一头戴日月宝冠的王者，着翻领窄袖长袍，手握一长杯，脚穿长靴。帐篷前铺设一椭圆形毯子，上面跪坐一位头戴毡帽的长者，有长长的胡须，身穿翻领窄袖长袍，悬挂腰刀，右手握长杯，与帐内人物对饮；帐篷两侧有三位侍者。有的学者认为长胡须者可能是史君的父亲或祖父，其左侧是史君。这或许有一定道理，即这里表现的仍是史君随同一个年长的商队首领（也可能就是他的父祖）拜访北方游牧汗国嘍哒首领的情形。

画面下半部描绘一个商队正在休息，中间有两个男子正在交谈，一人肩上都背着钱袋子。有一人牵着驮载货物的马，一人照料着两匹骆驼卧地休息，后面还有两头驮载包裹的驴子。这样的场景可以让人们想到一个粟特商队到达了一个丝路城市旁的胡人聚落，或可以和《史君墓志》的“大统之初（535 年），乡闾推搢，出身为萨保[府]判事曹主”的记载相对应，表明这时史君不是首领萨保，而是一个聚落中萨保府的下层官吏。

可以说，从 W3 到 N1，表现的是史君青年时的经历，包括狩猎、出行，以及拜访游牧族首领，获得他们对于丝路上行进的粟特商队的保护。而史君所跟随的商队到了一个聚落后，史君停留下来，并担任了萨保府的官吏。

### （3）结婚与担任凉州萨保

下一幅 N2 的场景比较宽阔，表现的一定是一个重要的场景（图 5），有的学者认为是 565 年史君被任命为凉州萨保的情形。应当考虑到的是，这幅图是第一次出现夫妇的形象，因此把它看作是史君与康氏婚礼的场景可能更为合适。《史君墓志》粟特文部分特别强调这场婚姻：“他的妻子生于 Senpen，名叫维耶尉思（Wiyusi）的女人。尉各伽与其妻在 Senpen 于亥（猪）年第六月第七日（兔日）结为连理。”据史君的年龄推算，他与这位康国出身的女子结婚的年份是 519 年，时年 26 岁。画面的正中是史君坐在粟特式的亭子中间，正举长杯与妻子共饮，两边是伎乐，庭前还有一个舞者和两个乐人。史君夫人一侧的后面，还有三

<sup>15</sup> 参看荣新江《Miho 美术馆粟特石棺屏风的图像及其组合》，《艺术史研究》第 4 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 年 12 月（2003 年 7 月），213—214 页，图 8a。

位女子和一个男子，手中都拿着礼物样的东西，是否为陪嫁的嫁妆。这种粟特式场景表示婚礼是在粟特聚落的环境中举行的，也即墓志所述的 Senpen（如果是西平，即鄯州，今西宁）粟特聚落。

随后的 N3 是男女主人出行图（图 6）。上半部的中心人物是骑马而行的史君，后面有人为他撑着华盖，前后有三名骑马男子前呼后拥，有人认为是他的三个儿子。下半中央应当是史君夫人康氏骑马而行，头上有华盖，后有三名女性，一位像是贴身的侍者，两位是随行女眷；另外，还有一名武士骑行在最前面，作为警卫。这幅图或许表现的是史君从一个聚落迁徙到另一个聚落的场景，也可能表现的就是从西平到凉州。有的学者把这幅图看作是史君从凉州入居长安，或表现史君被任命为凉州萨保，恐怕都难圆其说。

N4 的上半部刻画五个男人在庭院中宴饮，下部是他们的五位夫人宴饮图（图 7）。说者有的认为这是史君在长安隐退后的情形，有的认为表现的可能是粟特新年节庆。从史君的生平来看，这种欢庆的场景，更像是祝贺史君获得北周皇帝的任命，担任凉州（姑臧）胡人聚落的首领——萨保。画面上方有胡须的人物，应当就是有了一定年纪的史君。《史君墓志》汉文部分称：“（□□）五年，诏授凉州萨保。”粟特语部分说：“有一位出身史氏家族的人，（定居？）在一个（叫）姑臧（的城市），他从皇帝那里（得到？）凉州萨保的（称号？），（并且是）粟特地区的一个显贵（？）。”学者推测，他担任凉州萨保的时间当为北周武帝保定五年（565），史君其时已经 72 岁了。对比安阳粟特石屏上的图像，这里也可以说是表现的粟特人新年的场景，他们也可以选择这一天来庆贺史君担任萨保这一重要职务。

#### （4）逝世

按《史君墓志》汉文部分称：“本居西域，土（□□□□□□）及延（派？），迁居长安。”中有残缺，不知其迁居长安的时间。粟特文部分在叙述完史君的婚姻后说：“后来，在亥（猪）年第五月第七日（=579 年 6 月 16 日），在胡姆丹（Khumtan=长安）这里，他本人去世。”似表明史君夫妇迁居长安，是在去世之前不久。结合墓志标题和内容所示史君的最后称号仍是“凉州萨保”，说明他迁居长安至少在任职萨保的 565 年以后。入居长安这一点在史君的生涯上并不是那么重要，所以图像上恐怕没有直接的表现。

去世是人生最重要的一幕，所以 N5 应当就是去世场景的表现（图 8），其上半是一位老人在山中隐修的样子，墓志说史君去世时，享年八十六；下半则是三位天使从湍急的河流中拯救史君夫妇，墓志强调史君和他的妻子是先后一个月内的同一日去世的，因此把天使的拯救绘制在一起。《史君墓志》汉文称：“而天道芒芒（茫茫），沉芳永岁。大象元年（五）月七日，薨于家，年八十六。妻康氏，其（□□□□□）（同年六月七）日薨。以其二年歲次庚子正月丁亥朔廿三日己酉，合葬永年（？）縣界（界）。”粟特语部分说：“后来，在亥（猪）年第五月第七日（=579 年 6 月 16 日），在胡姆丹这里，他本人去世。此后在第六月的第七日（兔日），他的妻子也去世，就在此年此月此日（=579 年 7 月 15 日）。”在表现史君在世的最后一块石刻图像上表现墓志的这一重要内容，应当是合乎逻辑的。

#### （5）丧葬仪式与升入天国

图像转到东壁，描绘了史君夫妇的丧葬和升天的仪式，葛乐耐、黎北岚与杨军凯合撰的《中国北方西安新发现的粟特墓葬中的祆教画面》一文对此已经有详细的解说，我们没有太多的补充，现转述如下，并增添个别参考图像。

E1 和 E2 两幅（图 9）的下方绘制一座钦瓦特桥，这是信奉琐罗亚斯德教的死者灵魂必须经过的筛选之桥。在钦瓦特桥的桥头站着两位祭司，他们在那里为亡者举行送别灵魂的仪式<sup>16</sup>；桥旁的圣火帮助灵魂越过黑暗；在桥头山石的后面有两只护桥的犬。同样的场景可以在 Miho 美术馆藏的一幅粟特石屏画像上看到，那里是一个祭司，还有一些送葬的人员<sup>17</sup>。史君夫妇率领驼队和表示家产的动物行走在桥上，主人已经走过张着血盆大口的桥下怪兽的位置，表明即将进入天界。E1 的上部是粟特人崇拜的主神——风神（粟特文作 Wešparkar），样子很像佛教的摩醯首罗天（Maheśvara），因此常常被误解为佛像。其下是两个侍者簇拥的女神 Dēn（Daēnā，姐厄娜）在接引跪在前面的史君夫妇，她代替最高神阿胡拉·马兹达审视人的行为奥秘，让善人的灵魂走过宽阔的筛选之桥而进如“中界”（天堂）<sup>18</sup>。E2 描绘天使带着两匹戴翼的天马来迎接史君夫妇，其中有个从天国坠落的人物没有得到完满的解答，摩尼教教义中有“身体残渣、黑暗部分将坠入地底”，或许是从琐罗亚斯德教而来。E3 是整个图像的最后一幅（图 10），上下一体，上面是史君夫妇乘骑着有翼天马前往天国，周边是伎乐天神伴随而行；下面是一些有翼的动物也随史君夫妇奔向天国，他们是史君财产的象征。东壁描绘的死者灵魂之旅，和琐罗亚斯德教的文献记载一一相符。

在作为被墓志称作“石堂”的石椁正面，即南壁（图 11）。中间是两扇石扉构成的石门，史君夫妇的遗骨从这里被送进这座石堂；门楣上是长条石板，上面刻写着粟特文和汉文的双语墓志铭，记载着史君的出身、履历和去世的时间。门两边对称刻画着脚踏小鬼的四臂守护神；再外是窗户，窗户上面是伎乐人物，下面是半人半鸟的祭司护着火坛。根据琐罗亚斯德教教义，这种人面鸟身的祭司应当是斯洛沙（Srōš）神的象征，他在死者去世后的“第四天”早上帮助其灵魂通过钦瓦特桥。整体来看，南壁是典型的琐罗亚斯德教送葬时的祭祀场景。

由此可见，史君的三个儿子在埋葬他们的父母时，大概由于是北周皇帝赐予了长安城东的高贵墓地，因此没有采用琐罗亚斯德教的天葬形式，而是用中国传统的斜坡土洞墓和石椁形式，但又充分利用石椁提供的壁面，采取浅浮雕的形式，刻画了史君一生的事迹和死后的归属，以及按照琐罗亚斯德教举行的丧葬仪式。

近年来，有关丝绸之路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就是对丝路上粟特人的研究。根据考古、出土文献和传世材料，我们基本上可以描绘出他们从粟特本土到中国的迁徙路线、聚落分布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贸易网络。我们也可以从大量公布的石刻史料中，看到这些粟特商队首领入仕中国，变成乡团首领、军府统帅、王府宫廷侍卫，以及译语人、互市牙郎等。从粟特到中国，一个粟特首领如何从商人转变为聚落首领，最后落地生根，成为中国臣民，北朝末到唐朝初年是最为关键的时代，而史君石椁所描述的史君一生，正是丝路上一个入华粟特商队首领的典型事例。

<sup>16</sup> 关于祆教祭司，参看 F. Grenet, “Where Are the Sogdian Magi?”,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new series*, 21, 2007 (2012), pp.159-177.

<sup>17</sup> 参看 J. A. Lerner, “Central Asians in Sixth-Century China: A Zoroastrian Funerary Rite”, *Iranica Antiqua*, XXX, 1995, pp.179-190.

<sup>18</sup> 参看张广达《唐代祆教图像再考——敦煌汉文写卷伯希和编号 P.4518 之附件 24 表现的形像是否祆教神祇姐厄娜（Daēna）和姐厄媪（Daēva）？》，荣新江编《唐研究》第 3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6—7 页。

（2014年9月14日完稿，原载国家文物局编《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2014年，45-50页）